

沉默的视野

陈家琪 著

沉默的视野 视野的沉没

沉默的视野 视野的

沉没 沉默的

视野 视野的

沉没

C H E N M 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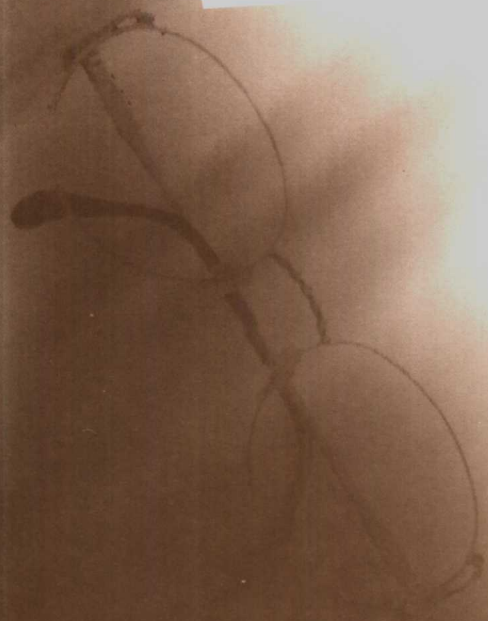
D E S H I Y E

上海文艺出版社

陈家琪著

汪黑由衣里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沉默的视野/陈家琪著.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1.7
(书屋文丛)

ISBN 7-5321-2269-7

I.沉… II.陈… III.社会分析-中国-现代 IV.D6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29223 号

责任编辑:赵南荣

封面设计:王志伟

沉默的视野

陈家琪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邮件: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港东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375 插页 2 字数 200,000

2001 年 7 月第 1 版 200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100 册

ISBN 7-5321-2269-7/I·1822 定价:16.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21-59671164

上 篇

视野的沉没

1

中国新闻出版社 1988 年 10 月出版的《实用家庭民历——万事不求人》第 248 页,在谈到“霉运相”时,有这样一段话:“昔谓四十二岁为男子之厄年,若为霉相而鼻为良相则能逃过大厄。”

1989 年,我四十二岁。

这年的 7 月 26 日,我因胆总管结石,出现了全身黄疸,皮肤瘙痒,小便深红,在医院里从内科转到传染科,从传染科转到外科,又是 B 超,又是胃镜,折腾到 29 日,拿着一张黄疸指数 31,G·P·T 700 的单子去住院。由于没有床位,又被送回观察室输液。观察室人声喧哗,简直无回身之地,只好拿着药回家。回家后五天滴水未进,人已处于半昏迷状态。8 月 14 日,学校用救护车送我到医院,算是住了进去,501 房 1 床位。

昏昏迷迷中的“虚”的感觉如同“轻”是一样的。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就这样飘来飘去地过了十天,8 月 15 日进了手术室。

在此期间,医院怀疑过是癌,也许在胆管,也许在胰腺,总之人不发烧,麻烦可能比单纯的胆结石大,于是找来家属和校领导谈话,让他们签字。这一切都静悄悄地进行着,我在各种各样的目光注视下,也学会了以别人的目光来怜惜自己,于是产生了一种距离感,觉得我应该向每一个走近我并稍稍看我一眼的人致谢。

这种感激之情来得很奇怪,一直到今天,我也想不通有什么可感激的,当然也谈不上抱怨。病是自己得的,除了抱怨“命”外,你还能抱怨什么?“昔谓四十二岁为男子之厄年”,这句话把一切都

说完了。住进医院,也不是说就没有可抱怨的地方,比如床褥的坚硬、饭菜的不可口、服务态度的冷漠等。但这些都是人未住院时就早已司空见惯的事;人在一个可抱怨的环境里一旦生活久了,到你真想抱怨一点什么时,油然而生的却是感激之情,因为毕竟还有大夫、护士的照料。当然,在这种感激之情后面,也不能排除想尽量给大夫、护士们一个好印象,以有利于对自己的治疗这样一种很功利的动机。所以在外表的有礼和温顺后面,也隐藏着对虚弱、对自己毫无道理地用目光向每一个人求助的掩饰。看来在艰难困苦、在虚弱和想求助于人的情况下,人与人的关系总有特别让人怀念的一面。

也许在道德与疾病之间确有一种因果的联系:一个人自我感觉愈强壮、愈富于成果,也就愈“非道德”;那么反过来,疾病倒往往会从道德上成全一个人,让人变得温和、谦恭和富有人情味。尼采说过,随着美德的出现,世界最终会变成一所大医院,因为每人都有病,就是没有病的人,为了有道德,也必须像有病一样地活着。所以他才歌颂强者,认为道德只是弱者(病者)的自我掩饰。谭嗣同在《仁学》中说,自秦垂暴法,于会稽刻石,宋儒炀之,目的都在“以愚贫弱死归诸民”,而“愚贫弱死者”也就信从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誓说”。可我现在确确实实是有了病,而且病得很重,现实逼得我不能不在一种道德的想象中摆脱“愚贫弱死”的巨大阴影;这想象即别人都以怜悯的目光注视着我,而我则报以感激之情。

人并不是因为什么事情真值得庆幸才充满感激,而是因为感激本身是值得庆幸的。“文革”时我们曾高呼过整整一夜的“毛主席万岁”,毛主席并听不见,听见的是我们自己;我们在为自己高呼,同时也是呼给自己听。记得当时常有人登台一讲就是好几个小时,讲了些什么无关紧要,重要的只是讲本身所遵从并强化的形式、惯例、套路(甚至包括语气、手势、表情的高度一律)能使自己获

得“与大多数人一样”或“站在大多数人一边”的自我满足。回到现实,也许对我来说,那时值得庆幸的就只有心中的感激之情了。人在受苦受难时倒更多感激、庆幸之情,这也很奇怪。由此想到人性中一定有某种特异的因素,正是这种被教育培养起来的因素使你产生感激或仇恨的力量;相对于这种力量而言,利己或利他、好事或坏事则都只是某些派生的、次要的快乐或痛苦,而一个人是感激的还是仇恨的,也并不取决于他经历了什么事、遇到了什么人。

那是一段褪去了一切喧哗与骚动,只剩下在单纯的感觉中越来越麻木,因而也就越来越虚弱、越来越温和的日子。

虚弱中,睁开蒙眬的睡眼,看护士小姐款款而来,然后就知道了一个“疼”字。确实只是一个“疼”字,一个不再有具体感觉、不再惧怕也无可躲避的“疼”字;与“疼”字相关的,是“打针”二字——而不是比“字”更为实在的什么事情。我曾经想从感觉上把肌肉注射、静脉注射、输液、皮试、抽血、碘过敏试验时的各种“疼法”区分开来,而且在与一位刚动过手术的病友的交谈中,也知道用小刀在手背上划一个口子与用手捏捏肠子一定是两种非常不同的“疼法”;但后来,我发现这些“疼法”都是不能在记忆中保留下来的,因为没有保留各种“疼法”的词语。毛主席曾说过,你要知道梨子的味道,就要亲口尝一尝。现在来看并不这么简单:你要知道梨子的味道,先得有关于梨子的各种味道的词语,比如酸、甜、酸甜、生涩、微麻等等(这先假定了人的味觉能力是一样的,而且假定汉语已有了足够多的传达梨子味道的词语);再说河北鸭梨与安徽砀山梨都叫“梨”,但味道一定不一样,你要是碰巧尝了一个不熟的梨子,你怎么能知道你知道了梨子的味道?而且谁也不可能尝遍天下所有梨子的味道,就是尝遍了,你也找不到恰当的词语来把各种事实上有着区别的味道告诉别人。这不是在抬杠,而是说现有的词语早已暗中限制住了我们的经验范围而我们却不知道,于是才把

个别经验上升为一般结论(词语都是一般,如梨子、甜等等),并把这一般结论等同于客观现实的存在甚或某种客观规律。你知道各种各样的“疼”和梨子的各种味道都是现实的,但“现实的”并非指一种纯然客观的现象,而是指人们在主观构拟中对一种“现象”的解释。正是在这样那样的解释中,“现象”才具有了客观现实性。我发现没有人对此感兴趣,于是自己只有默默忍受着,对“疼”只作一种量上的统计。不知谁说过,死一个人是悲剧,死一千万人就只是一个统计数字上的问题了;如果我只面对两个人,我会竭力把他们区分开来,如果我面对的是一千万人,他们就都只是一个“人”字。后来再一想,死一个张三是悲剧,死一个李四也是悲剧,我真能从“悲剧”上把这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的死区分开来吗?再说“悲剧”与“死人”并不同义。看来“区分”决非一种纯个人的行为,其内容与形式都受到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都需要在主观构拟中进行交流。没有交流,人几乎不需要“区分”。我发现没有人对此感兴趣,于是自己想有所“区分”的想法就显得很可笑,而且我也知道了无论我怎样温和,怎样充满感激之情,在大夫和护士眼中,我仍只是一千万个都曾如此表现过的患者中的一个。

做手术前,8月10日,先进行了一次穿刺检查,大夫们称之为P·T·C。在一间幽暗的小屋里,躺在一张冰冷的钢床上,头被置于两根钢柱之间,为的是左臂可以继续输液,同时用右手握紧另一根钢柱。刚躺下,我曾努力想使自己思考一下历史发展有无进步的问题,想转移一下自己的注意力,但很快地,就感到一根很长的钢针从肋间刺了进去。大夫事先就警告过,别咳嗽,别打喷嚏,更不要扭动。其实我也扭动不了。当钢针刺入后,我就觉得自己被钉住了,也许同麻药有关,总之是一种从内部通过物质的力量让你固定下来的感觉。什么叫固定?就是可以动而不能动。只有在可以动的前提下,不能动才有了意义。康德给“痛苦”下的定义就是“被

迫移动位置”，可见位置之重要。位置是通过物质力量固定下来的空间关系。一位研究政治学的外国人曾比较过毛泽东与邓小平，他说，毛泽东是位善于利用“空间”去改变现状的“布局”大师，因为他相信东方不亮西方亮。而且用这种构想去打游击，哪怕就是放弃延安这样的位置也在所不惜，从不在乎一时一地之得失；为了在空间关系中造成一种不平衡，他经常变换自己的位置：当他发现在北京发动“文革”不利时，就去上海；当他看到自己的意见受阻时，就扬言要重上井冈山；当他一时还看不清楚人与人在位置上的关系时，就远远地从南方的一个山洞里去往外看。邓小平则更相信“时间”的作用，他在政治生涯中屡受磨难，三上三下，最后都是“时间”给他平了反。毛泽东在“布局”，邓小平在“走棋”；一切变化都要靠时间中的“走”，也只有“走”才在时间中给了人“未来”。布局要的是空间关系，就如一幅中国山水画，在静止不动中给人以动的美感，所以毛也是诗人。“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就是静中的动，就是空间性布局。毛最长于对人与人之间微妙复杂的空间格局的把握，而且使你不得不惊叹那种全局在胸、调配有余的眼力和魄力。“走棋”类似于写小说，时间关系一带出来就有了情节，有了未来，有了目标，有了“回到”似的循环往复。总之毛邓二人都把中国人传统的审美理想（赋诗与叙事）运用于现实政治之中，至于在现实生活中的人是否也感受到了“美”，那就另当别论了。

此刻，当我被固定在钢床上，当障碍与距离都成为空间的、仿佛是自然存在于那儿的一种位置上的不可动摇时，是寄希望于时间，还是觉得有关永恒、价值、美德、理想和历史进步的观念都不堪一击？寄希望于时间首先得能活，时间是对“活”的考验。所以一位物理学家曾说过量子理论的胜利不在于它的正确，而在于反对者都先后死去了。但“活”又意味着什么？托尔斯泰曾说：“莎士比

亚的全部作品也抵不上一双皮靴。”萨特据此问道：在一个存在着饥饿的世界上，文学到底意味着什么？阿多诺（T·W·Adorno）问得更尖锐：奥斯维辛之后怎么可能还会想象有诗歌？我，一个充满感激之情的思想者，此刻被固定在钢床上，思想的自由与充满感激的温情是否真有些可笑？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美学把握”是否更近似于某种残酷？这时，我听见一个人兴奋地说：看得很清楚，一共三颗石子，全在胆总管里。

2 我一直是个比较胆小的人。胆小，是不是指胆囊小？这肯定没有证据。但离开了“胆”这个字，我们是否还能表达“胆敢”、“胆寒”、“胆力”、“胆量”、“胆怯”、“胆识”这样一些与“胆”有关的意思呢？恐怕不行。如果说“胆大”、“胆小”只指的是人体的某种自然生成的器官的大小，那么“胆小如鼠”、“胆大妄为”、“孤胆英雄”、“胆战心惊”就已是某种与“胆”有关的心理或精神状态的判断了。其实早在我们知道人体有“胆”之前，就已接受并理解了这种判断，而且从未把“胆量”与“胆子”的大小联系在一起。我说我胆小，是专就一种状态而言的，而状态又肯定与某种能测出你胆大还是胆小的事件、场合、情景、环境有关；“状态”就是这样一个把境况与心理结合在一起的一个词，这一点是过了很久之后才被我意识到的，而一旦有了这个词，过去的一切，无论是认知活动还是道德意识，就有可能在某种状态（语境模型）中加以回忆或唤醒：什么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整体状态？我自己在状态上又发生着怎样的变化？

我的胆囊炎其实是1986年就发作了的。那时到医院，只会说“肚子疼”，大夫们按压过几次后，才改口为“上腹部疼”。但“上腹部疼”也不准确，而且事实上从1986年到1989年，我一直在吃胃

药,也从未有过大夫提醒一下我人体内有胆囊,而且胆囊里还会长石头。也许医学在当代发展的标志,就是专用术语越来越多,越来越精确。但我不知道这种精确是否意味着人越来越娇嫩,越来越失去了抵抗力或忍受力。而且许多专用术语还无形中给人带来了许多莫名其妙的烦恼与恐惧,如此刻正折磨着我们的胆囊炎,还有老年痴呆症、帕金森氏综合症、癌症、艾滋病等等。读《三国演义》第一百十九回,书中写到钟会、姜维欲图谋反时,“维领命,方欲行动,忽然一阵心疼,昏倒在地;左右扶起,半晌方苏。”这里的“一阵心疼”,实际指的是一阵胆囊疼,因为他的胆囊炎发作了。何以见得?姜维被杀后,“魏兵争欲报仇,共剖维腹,其胆大如鸡卵”。大如鸡卵的胆里其实充满了石头。我住院时,邻床的一位省教委官员,手术后从胆囊里取出了五十多粒石子,大的比上海产的大白兔奶糖还大,这样推想,其胆也应大如鸡卵才对。不过罗贯中恐怕没有这样的医学知识,他写姜维“胆大如鸡卵”,还是为了表达世人对姜维的赞叹:“大胆应无惧,雄心誓不回。”“大胆”与“雄心”有关,两个自然器官在此一联系,便获得了对某种精神状态表示嘉许的意味。

不过人生在世,胆量的大小其实是很难在“状态”中得到实际测量的。在大部分情况下,“胆”的大小主要看的是“话”的大小。大跃进时有一句口号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地”与“产”有关,“胆”与什么有关?与“话”。就是说,话有多大,胆也就有多大。那时的产量并不高,高的只是“话”;那是一个以话壮胆、以话比胆的年代,总的趋势是话越大胆也就越大,胆越大心也就越红,还是罗贯中把“大胆”与“雄心”联系在一起的逻辑。后来听样板戏中的唱段,就常想起明清小说中赞叹英雄人物或表达雄心壮志的诗词,觉得在格局或逻辑上都差不多,而且说真的,中国人并不大相信时间关系,就是讲时间,也是并列的空间关系,所以这种唱词

的对偶句、排比句特别多。

仔细回想一下,那时的话语方式全是夸张式的,而我们这代人也是在那种话语方式中长大成人的。先是主题夸张,比如一件什么事连着江山会不会变色、世界革命能不能成功;再是词语夸张,全是豪言壮语;最后是间接夸张,比如用很平凡的话来烘托一个极度夸张的联想,如从海燕在海上飞翔想到革命者的不畏艰险,从一排排的白杨树想到人格的崇高。不过最有气势的还得数毛主席诗词。毛主席他老人家是诗人,从小就胆大,十三岁那年就敢回骂父亲,而且离家出走,当父亲想追他回去时,他能跑到一个池塘边,威胁说如果父亲再走近一步,他就跳进水里。其实池塘不会有多深,况且他还会游泳,但这话还是吓住了父亲。毛泽东说:“我从这件事认识到,当我用公开反抗的办法来保卫自己的权利的时候,我父亲就软了下来。”跳池塘和自杀作为实际行为其实并不能说明你胆大,更多的人自杀是因为胆小,说明的地方只在于你敢说出这样的话。我想在那个年代,真正胆小的人是不会回骂父亲的,他们只能用默默的流泪或自杀来结束自己的恐惧,只有毛泽东这样的孩子才会用“话”把恐惧传给对方,然后在胆量的比试中击败年纪比他大两倍多的父亲。1918年毛泽东二十一岁,在送罗章龙东行的诗中已充满了“年少峥嵘屈贾才”、“鲲鹏击浪从兹始”的豪情壮志。看这些诗句,很容易想起“文革”开始时我们那代人的精神状态(心态),好像全在模仿,但在模仿中又确能表达自己那种含糊不清的渴望舒展个性的情绪和幻想“翻天覆地”的愿望。总之在那个杜绝了风花雪月、才子佳人、哀怨离愁的年代里,语言只能以诗的形态表达,诗又只能表达自己的大胆,大胆就是雄心,雄心带来高产。于是人人做诗、天天比话、处处高产,以为如诗如画(话)的世界就是这样创造出来的。

当然,那个年代的人看似“话大”,其实又很“胆小”,特别是

1957年后。也许上面是想用“大话”来激发下面的“大胆”——这几乎成了当时共产党各级领导的例行公事和一贯作风；只要日常生活是以“搞运动”的形式组织起来的，怎样使人民大胆投入就始终反映着你的领导水平和组织能力，但下面用“大话”所掩饰的，又恰恰是自己的“小胆”，因为历史的经验值得记取。人生在世，大家都知道不大胆总无所作为，但另一方面，既然胆大与否离不开“话”，那就得仔细揣摩“话”之意思与意义：只知意思不懂意义不行，意思还不明白就在意义上无限拔高也不行。1970年8月在庐山开至关重要的九届二中全会时，毛主席在讲话中引用了一个典故：“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对所有与会者，特别是林彪一伙来说，第一重要的自然是搞清楚这句话的意思，包括何人所说，出处何在，目的是从字面的意思揣测内心的意思（意图）。中国人理解的“意思”主要是“意图”，指作者想说而未说或不便明说、让你揣摩的原意，但学习时宣讲的又是字面或文本的意思。能否从字面的意思领悟到意图，就看你是否是有心人了。“意图”已与“意义”有关。中国人理解的“意义”主要是现实的，看解决了什么实际问题，但学习时宣讲的又是长远的意义，看在思想上提供了什么原则。意思有字面表达与内心所想之分，意义有现实的灵活与原则的坚定之分，再加上人们普遍相信“话”必有“意”，“意”必有“用”，“用”即“话”的实现，所以语义与语用、话语与现实是不分的；长期进行这样一种宣传教育的结果，就使人们普遍习惯于在某种类似于精神分裂的状态中用思想观念的有用性去解释现实的一切，并因此相信一种空泛的为我所用的历史目的论。也许专门的语言学研究在中国开展得很晚，但有关能指与所指、言语与语言、并连与范例、隐喻与转喻在现实生活中到底意味着什么，中国人却知之甚精，因为所有这一切决不只是个学术问题，它切切实实地关系到人的荣辱得失、身家性命。总之那个年代是不需要词典（事实上也没

有什么词典)的,因为所有词语都不能依照词典上的意思来理解,而是自成一套只有在那样一种语言环境中才能有所领悟的结构与句法。所以严格来说,“文革话语”不是指的出现了哪些词语,而是指词语相对固定了的结构与句法,而且专用于激励那样一种特定的精神状态,事实上也正是那样一种体现着精神状态的结构与句法才支配着我们的意识,成了我们思想本身的活动方式。而且用“idea”、“meaning”、“significance”想翻译或表达中国人所理解的“意思”、“意图”、“意义”总不大能确切。

回想我从小学快毕业起直到后来很大时的作文,都充满了吓人的大话,尽管我实际上是个很胆小的孩子。那时真的是话越大,而越大的话也就越能证明你听话——听毛主席的话。从懂事起,这种奇怪的通过比赛看谁胆大来证明谁最听话的浪潮就一直是一浪高过一浪,而且在每一次发言、每一次作文、每一次批判会上,都只重现着同一种形式的比赛,那就是通过比看谁的话大来比看谁的胆小(听话)。“文革”后才知道了有“上纲上线”一说,而且几乎所有的人都深受其害,但这种毛病却是早在“文革”前就被那样一种语言表达的习惯或逻辑(结构或句法)训练而成的。后来看到一篇陈伯达的传记,才知道陈伯达真是一个生来胆小但又居于说大话位置上的人物;他被称为毛泽东的“文胆”,所以也就只能以写毛泽东之“文”来壮其小“胆”,有时壮(撞)对了,得意忘形一阵,有时又会壮(撞)错,于是吓得肝胆俱裂。1958年他发明了“人民公社”四个字,算是“撞”对了,很是得意了一阵;但也为自己的“头脑过热”埋下了伏笔,结果是1959年开庐山会议时,一会儿反左,支持彭德怀的“万言书”,一会儿又反右,而且比以前的“左”还要左。从“文革”过来的我们,后来终于渐渐明白了大凡在出身、历史上不大“干净”的人才更左,因为不如此不能用大话掩饰自己的小胆。当然纯粹解释成“掩饰”也不行。比如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

“文革”前最受“左”的迫害,但“文革”开始又最革命,而且最忠诚。总之越挨整越表忠心,越不干净越要洗刷自己,越有尾巴就越要夹起尾巴做人,这里也充满辩证法。但由于一次又一次的历史审查和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所以全然干净的人已为数不多,最后形成的局面就是比“左”之战,比“大话”之战,因为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御。

1989年8月12日,进手术室的前三天的晚上,我的胆管简直像爆裂一样地剧痛了整整一夜。汗湿透了枕巾、湿透了床单。我可能中途昏死过两次,也许是非常短暂的瞬间,就像一种连续的疼痛忽然中断了一样。我去找值班护士,她以为我是手术前的紧张,给一片安眠药就算了事;后来再问医生,医生说是胆管痉挛,没有办法的。我躺在那里,望着窗外的月亮,心想,到底是月亮给这个世界增添了诗意,还是“床前明月光”才使月亮成为诗意的存在?死亡是一件简单的事实,还是一种荣耀、一种损失、一种不朽的开端?或者,死亡说明了人面对世界的一种基本上只能顺其自然的态度吗?也许只有自杀才是对“自然”的抵抗;但此时的“痉挛”是“自然”的吗?我能怎样?哭喊?写诗?控诉?自杀?英勇无畏或感谢“自然”又给了我一次考验的机会?什么是词语后面的真实?我们能非词语地捕捉住这种真实吗?

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问:人能不能教会狗来伪装疼痛?

如果狗表现出疼痛,我们能不能知道它在伪装?

天快亮时,我惟一的愿望就是赶快手术,割掉这本来就小但在炎症中充大从而使人遭受痛苦的“胆”。

- 3 胆小的孩子一般听话。
“听话”二字很有意思,一是指“听话听音”,这“音”多半是弦

外之音；二是指听“话”的“说法”——怎么样说才对？

小孩子时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听话”，而小孩子对“听话”二字的最直接、最切近的领悟，就是“别哭”、“别闹”、“别要”中的“别”字，总之是否定，对“想怎么怎么样”中的“想”字的否定。“别”就是“听话”二字的弦外之音，而且这“音”在你心中，是对你心中之“想”的否定。

所以说让你“听话”，其实是不必说出“话”的，因为说不说“话”，“话”外之“音”都已传达给了你，而这“音”就在你心中。海德格尔说，惟有所领悟者才能审听：对“话”全然无所领悟的孩子能“听话”吗？比如在餐桌上，当一个外国小孩用手去拿食品时，我用他能懂的语言对他说“听话”，他能“听懂”我的“话”吗？

胆小的孩子听话，听话的孩子是对话外之音早已有所领悟，因为心中已然有“话”；“听话”二字不过是唤起你对心中之“话”的自觉，从而有了一种对心中之“话”的虔诚与敬畏。“听话”是对一种姿态的要求，这要求就是服从心中之话。“对我们头脑中的所有物抱有虔诚之心，这也许属于认识中的道德因素。”这里的“所有物”主要指的是各种各样的形容词。名词与认识有关，形容词与道德（审美）有关，动词、介词与关系有关，我们的汉语历来就对此不加区分，名词也就是形容词、动词，所以认识也就是道德（审美）。

从我们很小的时候起，“听话”就是一种道德上的要求。我想，信仰、虔诚、敬畏之所以能作为传统世代活着，就是因为小孩子都是从“听话”而成人的；而“听话”二字中的“话”是什么并不重要，每一代人也都有与另一代人不同的“话”，但在“听”上的要求却都一样，这就是对心中之“话”的信仰、虔诚与敬畏。

心中之话，对西方哲学家来说，主要是个认知问题，讨论“天赋观念”也好，讨论“先验范畴”也好，甚至包括分析话语的社会、文化、心理功能，还有回忆中命题总体的或局部的连贯方式，都是把